

上海企业家为何集体“沉默”

比如,人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在我看来,“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所以,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

东北民间商业缺乏“创业基因”

跟上海相似的一个困惑,也体现在东北——东三省,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

说东北肥沃,不仅是说土壤,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惟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

一方水土养一方商帮

□ 吴晓波

中国人坐一桌,大江南北,声音、饮食和服饰全然不同;中国的企业家坐一起,同样的五花八门,各有禀性特色。在这个群体中行走,往往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讨论,在这些话题的背后似乎有很多历史和体制的故事存在。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从地缘系谱的角度,寻找中国企业家的水土差异,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一些你平时想不清楚的问题,会突然豁然开朗。



●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它也是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载手段。马帮历经沧桑,在马帮的赶马人和马锅头身上,形成了许多触目的精神特征。而这些精神特征正是过去仅仅追求安居乐业,向往平和中庸的许多中国人身上所缺乏的。

只占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但是,三十年来,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

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已经理所当然地被窒息掉。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能够出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是却出不了企业家。

这样的“土质”已经形成将近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国有企业生锈衰落,民间商业缺乏基因,昔日的优势陡然变成了“包袱”,因而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广东企业家动不动就喜欢“北伐”

再说东南沿海一带,这里的企业家也很有特色。比如说,很多内地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广东的企业家动不动就喜欢“北伐”?

1990年代初,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无论企业的大小,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一张中国地图。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

那时正是广东粮、珠江水“北伐”全中国的“龙兴时刻”。一直到今天,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

这样的气质似乎又与“水土”有关。

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被乾隆帝定为“一口通商”之地,中国沿海

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朝廷设立“十三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为皇家的“小钱袋”。正因如此,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陶瓷、茶叶、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由市成城,因贸而工,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此外,广东还是买办阶层——现在我们称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的萌芽地,据法国学者白吉尔计算,到1910年前后,全国有10万个买办,广东占了一半,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中国人。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北伐”成了常态,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

1978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在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当开放政策提出之后,港商率先提出“三来一补”,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三是粤商的“北伐”传统仍然健在。于是,大量新潮的服装、食品开始倾销全国,最后在中国改革史商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80年代,看广东”。

1999年后,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

粤商喜欢外出征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南腔北调,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

浙江商人轻实业而好资本

再比如说“浙商”,近十年来,没有哪个地方的商帮比他们更出名的了。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

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州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着气质上的惊人类似。

从地缘系谱的角度,寻找中国企业家的水土差异,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一些你平时想不清楚的问题,会突然豁然开朗。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陕商题材：文化产业的富矿

日前,首届“陕西商帮与市场经济萌芽高峰论坛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专家学者等共同研讨明清时期在中国商界具有广泛影响的陕西商帮及陕西较早产生市场经济萌芽问题。

陕商曾称雄中国500年

“陕商是明清时期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曾创造了中国商业历史上诸多第一。”西北大学教授、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说,明代最早的商帮是由陕商建立的,唐代最早的茶马古道是由陕商首先走出来的,最早的会馆、最早的合伙经营制度、最早的股份制等等都是由陕商首先创立,比西方早了几百年。

明清时期,陕商以财雄势宏被誉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曾感慨“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陕商有丰富的题材可发掘

“作为独特的文化遗产和一种典范的商业现象,陕西商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唐以前贵为‘国商’,在明清时期与晋商、徽商并称为三大商帮。在前后500年的商贸活动中,为陕西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说,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商帮文化研究热潮,已经成为追溯经济发展史,助推商业文明的有效载体。希望有更多的社科工作者加入到商帮研究队伍中来,通过梳理陕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挖掘陕西商业文化,真正担负起陕西本土文化研究和传承的重任。

胡悦说,陕西商帮题材是陕西发展文化产业的一座富矿,等待发掘、提炼、升华和改造的内容十分丰富,是陕西最具潜力与魅力的文化资源之一,只要下功夫认真挖掘,就一定能够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大有作为。

陕商将投拍连续剧《西秦大贾》

据了解,目前由陕西省委、省政府指导,李刚为领军人物的陕商推介主力团队资助陕西文化界创作了一系列反映陕商文化的影视作品。即将投拍和拟拍的影视作品有35集电视连续剧《西秦大贾》、30集电视系列片《陕商》、电视讲座片《李刚话陕西》一系列文化产品和项目等。

李刚说:“不久的将来,全国将会刮起一股新的西北风,那将不是信天游,也不是秦腔,而是唱着信天游和秦腔的陕西商人,人们将会从银屏上了解古老而又年轻的陕西商业文化,认识陕商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和他们不朽的创业传奇。”

(赵明 阮班慧 马骁 葛兰)

温商迪拜空手归 投资信心仍很足



商业信息,并对哈利法塔的投资空间充满信心,组建集团公司,更有利于和当地政府谈判,获取相关优惠政策。

“我认为,迪拜的房价已经触底,现在是投资的最好时机,一次次



小项目。”

对于此次迪拜考察空手而归,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这再正常不过了,考察需要周详。他也带领一个投资团对迪拜进行过几次考察,空手而归也属于

投资的前期必经之路。他也认为,迪拜的房价已经触底,现在非常适合投资。除此之外,他所带领的温州投资团还收到了伊拉克驻华大使馆的邀请,他们将出动军队来保护温商对伊拉克进行投资考察。(吴好)